

·学术论坛·

1950年代苏联图书馆事业对中国的影响*

吴稔年

(江南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 文章通过对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的简述, 阐述了中国图书馆界从译介苏联图书馆论著的主要人物与成果到图书馆服务精神与图书宣传、分类编目理论与目录体系的引进与指导、图书馆学教学体系的引入和教改、馆际互借以及国际交换等工作的开展各个方面, 学习苏联图书馆界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史实。

〔关键词〕 学习苏联 图书馆事业 中国 1950年代 图书馆事业史

〔中图法分类号〕 G259.29

〔引用本文格式〕 吴稔年. 1950年代苏联图书馆事业对中国的影响 [J]. 图书馆, 2017 (3): 48-55, 62

1949年10月5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 刘少奇同志在成立大会的讲话指出: “苏联的文化完全是新的文化, 吸收苏联新的文化作为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针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1]。这一讲话, 为我国制订文教政策奠定了基础。1950年2月14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苏联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援助, 同时也为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和保障。“人民民主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主要是依据苏联所开拓了的道路, 及被社会主义建设诸项任务所决定的道路”^[2]。这些指导思想对我国建国初期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推进作用。

1 译介苏联图书馆论著的主要人物与成果

根据卓连营、李晓娟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 1909—2009》(2012)统计, 从1949—1959年, 我国正式出版的图书馆学方面的苏联译著有45种, 内容分别为: 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综论、读者工作、藏书建设、分类编目、各种类型图书馆、世界图书馆事业等。最早出版的是由舒翼翬翻译的“苏联图书馆事业概观”(1949), 书中论述了苏联图书馆事业发展简史。在出版的译著中, 关于“苏联图书馆事业”主题的最多, 达16种, 可见, 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界迫切需要了解苏联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貌, 以便能很好地学习借鉴。其次是分类编目和各类型图书馆, 各有9种, 表明在图书馆业务中, 对于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的分编的研究和实践, 是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研究的业务。大力介

绍苏联各类型图书馆工作, 说明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界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 无论是大政方略, 还是具体工作, 都急需学习苏联的经验。

此时的图书馆界, 形成了一个翻译著作的群体, 译者(以第一责任者计, 团体责任者不计在内)达24人, 其中翻译1种著作者17人, 2种者3人, 3种至5种者各1人, 8种者1人, 形成了以7人为主体的(2种或以上)的翻译群体。其中苏大梅8种, 舒翼翬5种, 成为界内公认的翻译大家。另有李哲民、杜定友、金初高、刘国钧等人, 并且各有特色。

在论文译介方面, 以《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8期集中刊载苏联的相关译文为标志, 是对分类法的研究与介绍的起始, 是期集中刊载了5篇译自苏联的译文。在论文的译介中, 同样形成了一个群体, 这一群体以苏大梅、舒翼翬为核心, 包括何纪华、金初高、武宁生、李哲民、范先翔等人。此时, 如刘国钧、李哲民、郭庆芳等人, 除自己译介外, 还做了许多校稿工作。同时, 许多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也开始加入了译介队伍, 如张琪玉、白国应等人, 一些留学苏联的学子, 还直接撰写图书馆有关情况介绍, 如彭斐章、鲍振西、赵琦、汪长炳、赵世良等。

2 图书馆服务精神与图书宣传

为更好地构建新时期的图书馆服务体系, 开始大力译介有关苏联图书馆事业的论著, 大力引进对事业的“担当”和“使命”观, 及时译介了苏联《图书馆员》社论: “文化教育工作也像其他各项社会活动一样, 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年’图书馆事业与学术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 16FTQ003)阶段性成果。

求人们把全部思想和精力都放在他所担当的事业上。这不仅仅是职业而且是使命”^[3]。

此时译介了许多有关苏联各类型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内容,介绍了苏联图书馆如何全力做好读者工作,大力吸引读者到馆利用文献,大力发展新读者,利用目录宣传图书,通过与读者的接触加强宣传图书,指导阅读工作,了解到苏联的读者人数“仅在1955年就增加了2,105,000人,达到24,754,000人,占全部居民的22.3%”^[4]。通过读者座谈会、读书会、展览、辅导阅读、图书馆宣传画、讲演会、朗诵会、图书评介、图书馆晚会等各种方式,积极宣传图书,指导阅读,拓展工作,吸引读者。据统计,1956年,苏联大众图书馆组织了104万次展览会,25万余次文艺晚会和读者会议,近57万次的书目宣传会^[5],这一数据充分反映出了苏联图书馆读者工作开展得深入、广泛、扎实。这些经验的及时引进,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全国公共图书馆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后,大力开展创新性工作,开展图书馆的群众工作。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结合中心任务配合各项政治运动与国际重大事件和纪念活动等方面,充分发挥出了主观能动性。“根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三年度下半年在国内八十七个公共图书馆中就举行了展览会716次,参加人数1,312,215人;报告会166次,参加人数61,049人;座谈会308次,参加人数9,552人”^[6],将我国图书馆服务工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图书馆界及时引进了苏联列宁图书馆开展的“帮助读者”工作,他们编制阅读计划和推荐书目计划,以吸引读者,引导读者去重视各种现实问题,并帮助他们养成系统的阅读习惯。这种辅导阅读的工作,一直是苏联图书馆读者工作中最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国图书馆界及时引进苏联图书馆辅导阅读的工作方法,“近来我国有些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始试行为读者编制阅读计划,进一步提高了为读者服务的作用”^[7],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要使图书馆事业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图书馆及图书馆员必须要有担当意识,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也要有竞争意识。列宁早在1919年就阐明了这一点:“图书馆事业(当然包括‘农村阅览室’、各种阅览室等)最需要的是发动各省之间、各团体之间、各阅览室等等之间的竞赛”^[8]。在克鲁普斯卡娅的积极组织下,1935年7月15日宣布了关于组织图书馆事业模范地区的全苏竞赛,并组成以克鲁普斯卡娅为主席的委员会,大力开

展竞赛活动。之后“在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里都颁布了‘功勋图书馆员’的专门称号”^[9],许多优秀的图书馆员都获得了荣誉奖状、优异工作证章与奖状和各种类型的表彰。这一做法,为我国各界广泛引进,通过各种评比活动,图书馆界推出了大量的各个层面的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在读者服务工作中,开架服务与闭架服务,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服务理念的问题。建国初,我国图书馆界在部分图书馆中开展了部分开架服务工作,但是,这一工作如何开展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此,及时译介了苏联的经验。

1959年,《图书馆学通讯》第9期及时开设了“关于图书开架借阅问题的讨论”专栏,刊载了《对图书开架借阅问题的管见》和《也谈图书开架借阅问题》,对开架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这一时期,总体上对开架借阅给予了肯定,这是由苏联的经验以及我国许多图书馆开展不同规模与范围的开架服务的实践作支撑的结果,“从开架后的情况来看,开架借阅的优越性是很显著的”^[10]。苏联读者工作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引入,加快了我国图书馆读者工作的建设步伐,其经验与教训,使我国读者工作的开展少走了许多弯路。

3 分类理论的引进与指导

1950年,《文物参考资料》第8期专刊刊载了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图书分类法和有关理论,其中译自苏联的文章和分类法,成为建国后最早批量引入的苏联图书馆学论著。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了图书分类在图书馆工作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关于应当根据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图书分类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11]。并以苏联编制分类的指导思想为指针,“关于图书馆的分类学,我们首先提出意识形态上性质的要求,而后才是纯正技术的要求。……这种分类必须要以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为依据,并且应该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任务和需要”^[12]。通过介绍当时苏联主要使用的分类法,使我国图书馆界对苏联图书分类法有了感性与人性的认识,进而为我国分类法的编制起到了指导作用。

1951年,《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东北法》)的修改本,就进一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合在一类,作为特藏类目,列于分类法的首位,并且包括了他们的生平事业。“泽东文库”和“马恩列斯毛著作”类目的出现,对我国分类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3]。195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人大法》)的问

世,是我国分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它为我国编制完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为基础的新分类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13]。在1953年8月出的增订第二版、1957年出的精装第三版及以后的各版,每版都有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在编制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托罗帕甫斯基和克列诺夫的图书分类法,还学习了国内山东省立图书馆和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及国内专家先进的著作,如:杜定友同志的‘图书分类法底理论体系’、刘国钧同志的‘图书怎样分类’及其他多人的著作”^[14]。

苏联图书分类法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1950年代编制分类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图书分类法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从1950—1953年“以苏为师”阶段:大量译介相关论著,以供学习、指导。在这一阶段产生了我国过渡性的《东北法》、《山东法》(山东省图书馆编)等在当时较有影响的分类法,具有时代意义的突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新旧分类法思想指导的分界与标志。尤其是《人大法》的编制并出版,第一次在我国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列为基本大类,并冠于分类法之首,突出地显示了分类法的指导思想,从而在分类法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完成了“以苏为师”的转折。

(2)1954—1958年:吸收、消化、创新阶段。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重点在社会科学方面,通过对苏联分类思想与体系的学习借鉴,全面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法的研究编制阶段。刘国钧通过对苏联文艺书籍的分类原则思想构建的翻译,并根据我国社会文化和文献出版的特征,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是构建中国特色分类法的代表。这一阶段,以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划分的理论为依据,建立了文献分类体系,主要代表是《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简称《中小型法》)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1956年开始,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召开了编制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研讨会,对编制原则、方法、体系结构和标记符号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并成立了分类法编辑组。1957年完成并在全国中小型图书馆中普遍使用,完成了统一分类法的飞跃。这部分分类法首次构建了“五大部类”,并按学科内容进一步展开为21个基本大类。《科图法》于1954年开始编制,1957年4月完成自然科学部分的初稿,1958年3月完成社会科学部分的初稿,1958年10月出版,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内容。这两部分分类法构建了中国现代图书分类统一化的主体,辅之以“人大法”和特殊的古籍分类法等,标

志着中国图书分类法进入了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时代。

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延续和扩展。1950年6月2日,文化部文物局召集部分专家在京召开“图书分类法座谈会”,讨论研究了“要怎样一个性质的分类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是集中还是分散”、“用十进分类法还是用新十进法?”、“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分列还是合并为一类”、“宗教有无单成一类的必要?”等方向性问题。讨论中许多关键之处都以苏联的处理和表达为指导。如在讨论新十进法时就认为:“苏联对十进展开式称为新十进法,即用附加号的方法,这样可破十进的限制”^[15]。可以说,在开始构建我国图书分类法之时,已经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法作为终极目标。自第一阶段中的《人大法》开始,已用毛泽东关于知识划分的理论为依据构建体系结构,并突破了十进之束缚,采用新十进法,将整个文献分类体系划分为四大部类,各部类又按学科内容进一步展开为17个基本大类。总体而言,第一阶段是以“学苏”为主,创新为辅;而进入到第二阶段,具有特色的创新逐步成为主流,其成果积淀于分类法中。

(3)深入发展阶段。1959年,为进一步解决大型图书馆文献分类问题,在文化部和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开始“大型法”的编制工作。可以说,这时又处在中国图书分类法到底向何处去的关键点上。1958年7月2日和10日,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学术委员会举行了两次关于图书分类法问题的会议。在后一次会议上,各专家就分类法基本序列进行了辩论,主要观点有三:其一,自然科学类位于社会科学类之前;其二,社会科学类位于自然科学类之前;其三,根据具体情况而由各馆自行决定。最后,“学术委员会同意了下列的次序: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总类”^[16]。刘国钧迅速将这一基本序列译出^[17],以供参考。《图书馆学通讯》于1959年第7期刊载了蒋一前执笔的《图书分类表五分法中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之前的看法》和袁涌进执笔的《论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自然科学应列于社会科学之前》两文。第9期又专列栏目“关于图书分类法基本序列与标记符号问题的讨论”,载有武宁生《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图书分类法基本序列中先后问题的商榷》一文。可见,当时认为在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中,将自然科学列类于社会科学之前的呼声还是较高的,最终,编委会仍然坚定地采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划分理论为依据的体系结构。

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了中国图书分类法问题已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正确道路,并坚定地不断完善。

4 从目录体系到目录学

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分类与编目工作紧密结合、不可分割。建国初,在分编方面,中国图书馆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分类问题,由此对苏联先进经验的介绍中,目录问题的译介工作要略晚于分类问题。1952年,《文物参考资料》开始专门刊载有关苏联图书馆目录、书目方面的译介文章,主要是“书目提要”问题。

4.1 书目工作的译介

苏联的出版事业发展迅速,参考工具书的出版亦随之大增,“在一九四九年内,俄罗斯联邦省立图书馆、边区图书馆和自治共和国图书馆所发表的文艺作品参考书籍中,书目提要手册占优势”^[18]。这一趋势引起了我国图书馆界的重视,《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3期,集中刊载了4篇译介文章,有柯连捷尔《论省立图书馆的书目提要手册》、伊凡诺娃《关于编制介绍性的书目提要的工作经验》、巴实采夫《书目提要本质的研究》和萨哈洛夫、佛拉德琪娜合著的《论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的工作》。柯连捷尔提出:“至少要推荐一些书籍,资料的清楚分类,简短的评注,正确地阐明书籍的内容——这些,是对于书目提要手册的基本要求”^[18]。指出编制介绍性的书目提要,是书目工作中的一种复杂形式,需要编制者具有各种专门知识,同时需要花费许多精力,关键要解决好书籍的选择问题,进而要直接地认识所选图书^[19]。还有伊凡诺娃有关编制介绍性书目提要的工作经验,进一步引起了我国图书馆界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促进了这一工作的开展。

在1959年2月9日至12日的国立列宁图书馆,图书馆界举行了“苏联书目工作的现状和任务”的讨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以及关于思想工作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宏伟任务,来讨论苏联书目工作的现状及任务”^[20]。我国图书馆界部分留苏学生参加了会议,如彭斐章。及时对会议的基本情况作了报导^[20]。随后,还撰写《苏联省图书馆书目工作的组织》,阐明“省馆书目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编制和出版推荐书目和科学辅助书目”^[21]。同时阐明了省馆书目部的分工原则。因此,我国图书馆书目工作是通过不断借鉴苏联的书目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展开,而向前发展的。

4.2 编目工作的译介

在1952年的译介工作中,提出了编制目录的问题。“目录具有为读者服务的重要任务。现在,为读者编制目录的问题,是一切图书馆界人士所注意的中心问题”^[2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迫切需要产生一种新的编目理论与实践,“这种编目形式能使读者通过阅读来贯彻我们政治上的正确领导和党的领导”^[22]。这是苏联图书馆界摸索创造改善目录新方法中的首要问题,同时要力求选择图书和分类问题的正确性。通过对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的工作情况的译介,既使我国图书馆界了解了苏联图书馆在目录工作中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更使我国图书馆界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

在苏联的目录体系中,十分重视分类目录的编制与组织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图书馆界对分类目录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首先研究与分类目录组成工作的各项基本原则有关系的几个问题,就是那些至今远未被弄清楚的问题”^[23]。苏俄文教委员会图书馆管理局在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技术最低标准”中规定:“每一个图书馆都应以分类目录作为主要目录。苏联目录学专家根据当时苏联图书馆界的实际情况,认为“绝不能忘记:在极大多数大众图书馆中,主要的并且往往惟一的一种目录,就是分类目录”^[24],图书馆在编目工作中,“首先是从编制系统的(即分类的——译者注)和字顺的(按字母顺序——译者注)目录以及报刊论文卡片目录开始的”^[25]。苏联图书馆界坚持分类目录的主导性作用:“苏联图书馆的主导目录乃是一切类型的图书馆都应编制的读者分类目录”^[26]。同时,对字顺目录的编制法亦同样加以译介。在目录组织中,如何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目录的作用?“帮助这个目的的实现,最重要的应当是图书分类方法,标题的一贯性,书籍的公式化,和目录的编排”^[24]。从而保证目录组织的计划性、一贯性、规范性,由此,著录原则与条例的问题及时地提了出来。根据借鉴、消化、吸收的原则,伍宗华撰文《图书编目工作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认为著录原则必须是:“一切图书馆的著录,都必须服从于编目的目的和任务——宣传马克思(思)列宁主义,指导读者阅读。著录的方法,必须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27]。

为产生新时代的文献著录条例做准备,刘国钧译介了苏联学者华西里夫斯卡娅编的《出版物著录统一条例》,1957年译成,1959年出版。为坚持质量第一,译者“在最后付印之前曾托沈祖荣教授对译稿校订一次,并征得沈教授同意,在某些地方采用他的译文,使

本书质量有所提高”^[28]。该条例由苏俄文化部文化教育管理局图书馆管理处颁布,是苏联出版物著录规则。书中有大量的著录条例,对各种出版物的著录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与说明。这些译介,对提升中国目录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4.3 目录体系的译介

这一时期,目录体系的组织与建设,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为借鉴苏联图书馆界目录体系建设的经验,翻译了一批有关目录体系方面的文章。首先是明确目录体系的要求是什么?何纪华及时翻译了苏联目录学家克利诺夫《论大众图书馆目录的体系》一文,克文提出了4项要求:要揭示图书馆关于政治和科学方面藏书的内容,读者目录在体系中要起主导作用;全国图书馆网建设中的目录体系和读者服务的任务要一致;要多途径地反映馆藏,分类目录要起到馆藏主题揭示的作用;维护好目录,并与图书馆的书目参考工具相适应。为更直观地了解苏联图书馆目录建设,刘国钧译介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的目录体系》一文,文章介绍了该学校目录体系由字顺目录、分类目录和主题目录组成,系图书室与教研室和资料室的目录一起组成联合目录,建立起整个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全部藏书的联合字顺目录。通过针对分科的、有区别的读者服务工作的建设,产生了分科服务的可能性,同时集中编制分类目录和主题目录,可以保证目录体系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明确了莫斯科大学近期目录建设的方向:“如果说,我们从前基本上是从从事于单独编制各种目录,那么,在今天弄清楚组织整个目录体的一系列困难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并且接近于解决了”^[29]。杜定友在《目录的体系》文中,自觉地以苏联目录学家祁西列娃等的理论为依据,对图书馆目录体系问题加以研究,认为“‘目录的体系’就是图书馆各种类型目录的序列并表明其内容和彼此的相互关系”^[30]。杜定友先生提出了目录体系建设过程中的组织形式、著录形式、卡片形式、序列形式和装备形式等五大部分,从而在理论上、规范上阐明了这一问题,在借鉴苏联经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目录体系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4.4 目录学理论的引进

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苏联图书馆学界鉴于目录学的专业性和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将其作为一门独立课程教学“图书馆目录问题,由于它们的特殊性,已分出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31]。苏联大百科全书1950年版更是将目录学提到了战略高度,“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国家把目录学视为最重要的国家事

业”^[32]。目录学的任务,亦是我国图书馆界急需搞清楚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录学是编制和研究出版物的索引、目录、评述的方式方法的一知识部门。目录学的任务是查明、记载、揭露和鉴定出版物”^[32]。苏联目录学的基本特点是科学性、思想性,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目录学的发展,取决于国民经济、科学、文化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建设的需求,这是目录学发展的基础。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50年代中后期,苏联图书馆学界在对目录学研究对象与任务的讨论上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书目资料;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书目实践工作”^[33]。此外,还有许多目录学的理论问题没有定论,这也说明了目录学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和复杂性,我国的目录学理论与实践工作,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向前发展。

5 引入图书馆学教学体系,开展图书馆学教学改革

1951年7月5日,经苏俄部长会议同意,文教机关事务委员会学校教育处批准了苏联的图书馆学课程教学计划,并由苏联国营文教图书出版局于是年出版。这一教学计划,立刻由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教研室翻译后出油印本,作为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制订图书馆学教学计划的参考。这一教学计划,明确了苏联图书馆学教学的任务是:研究图书馆一切现象中的苏联图书馆制度,研究苏联图书馆的多方面活动^[34]。计划中将目录学课程另外列出,图书馆学课程内容包括普通图书馆、图书馆藏书、读书指导、苏联图书馆组成等4个方面。“图书馆学课程教学计划”的译介,为我国制订新时期的图书馆学教学计划提供了指导、借鉴。

随着全国各地纷纷开办图书馆干部训练班,教学大纲、教材就成为重要参考依据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刘国钧于1953年及时地翻译了苏联的“区图书馆工作人员一个月进修班图书馆事业课程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与“农村图书馆工作人员两个月训练班图书馆事业课程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其中,办理区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的目的与宗旨是:“以提高图书馆员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水平并扩大他们的专门知识以便有效地对读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为目的”^[34]。农村工作人员培训班的教学“目的在从有中等学校程度的人员中,培养农村图书馆工作人员”^[35]。“‘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是从俄语中直接翻译过来的”^[36],大纲中详细规定了培训班的时间、对象、课程、要求等内容。这两个教学计划与大纲,

对新中国图书馆学教学事业的起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计划与大纲的目的、宗旨,还是教学计划的制订、安排、课程的设置等,都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随着中苏交流的深入发展,两国间在各个领域开始了频繁的交流活动。在留学生的派遣方面,建国后规模地向苏联派出留学生是在1952年,“留学苏联预备学校于今年暑假派遣187人出国;暑期再招生1,144人,准备1953年暑期派遣出国”^[37]。图书馆界则于1955年批量派出留苏生,前往苏联莫斯科图书馆学院学习。是年7月,苏联政府派遣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来中国工作,主要是帮助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科建设。是年8月,佟曾功、鲍振西、赵琦、彭斐章、郑莉莉、赵世良等6人赴苏联留学。

此时期,在苏联的我国留学生也较多地将所见所闻及亲身体会,及时地介绍到国内。如鲍振西在1957年第11期的《图书馆工作》上撰文《学习·生活·友谊》,介绍了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学院的课程设置。课程分为3大类:①政治理论课,包括苏联共产党历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②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业课,包括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目录、图书馆藏书组织、阅读指导、图书馆事业史、普通目录学、专科目录学等。③文化基础课,包括俄国文学、世界文学、苏联历史、世界历史、教育学、心理学、工业生产基础、农业生产基础、外国语等^[38]。同时,及时译介苏联的相关文献以供参考。在1959年,苏联“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等三所国立图书馆学院和七个附设于个别加盟共和国的大学和师范学院内的图书馆系科。各个国立图书馆学院给国家培养了13,000名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专家。现时在这些学院各系、科学习的学生总人数为11,000人”^[5]。同时还有大量的中等技术学校,1957年中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达15,000人,其中8,500人是函授学习。已有130多名图书馆专家获教育学副博士称号,“1957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图书馆学院有45名研究生在学习,其中19名是函授生”^[5]。通过这些介绍,既了解了苏联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状况,更使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比较出了差距,由此,才制订出我国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最早产生于苏联,初创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成熟于40—50年代,繁荣于60—70年代^[39]。丘巴梁《普通图书馆学》(1960)一书指出,它是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在人类与书籍和“图书馆与社会”这两个综合性

概念中,“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苏联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它包括图书流通和图书馆过程的各种复杂课题,而主要是从它们的社会意义上进行研究”^[40]。

在学习苏联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开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内容。1959年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等教材的诞生,具有标志意义。

这一时期,构建图书馆学教学体系、开展图书馆学教学改革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49—1953年,亟待建立图书馆学课程体系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百废待兴,还来不及建立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学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亦以因袭旧中国图书馆学教学内容为主,例如1950年7月孙云畴同其他9名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回国,“回国后不久,他就在北大担任分类编目和图书馆学概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41]。由于深感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达,“在讲授‘图书馆学概论’时,由于他对美国图书馆事业颇有赞美之词,受到一些同学的批评”^[41]。这一阶段,通过全国院系调整,我国高教架构已确定,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苏联引进教学体系、结构和内容。刘国钧译介苏联图书馆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正是这一阶段迫切需要的体现。第二,1954—1958年,以苏为师,构建体系阶段。1954年,高教部在高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中明确了“图书馆学”学科,1955年,开始了中国图书馆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订。这一过程是在苏联专家及苏联文献的指导下完成的,可以说大致套用了苏联的体系与计划。但在教学内容等方面则体现出中国特色,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群众性”大搞科研,大量调研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与有中国特色的教材研究。这一阶段的教学人员,从以一代、二代专家学者为主逐步过渡到三代学者同堂的局面,建国后第三代学者已培养出来,同时第一、二代专家学者逐渐开始退出教学舞台,如在武大图书馆学系任教的、1930年文华图专第八届毕业生陈颂,即于1958年退休^[42]。其三,1959年开始,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体系。“‘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初稿)一书的编写,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件新事情,它标志着,在这门科学方面,我们已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43]1961年三校合编的“统编教材”的诞生,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构建。

6 馆际互借与国际交换

建国初期,我国图书馆界在与苏联实行的文献馆际互借与国际交换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

1953年10月,北京图书馆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

基础上,为了满足全国各地读者的需求,促进图书交流,有重点地开始了全国各省市公共图书馆间的邮递互借工作。该馆在吸收苏联互借办法的基础上,制订出了“北京图书馆建立馆际互借办法”。“今后,通过馆际互借,将使远在深山里勘查祖国富源的地质工作人员和居住在边疆的读者,都可以读到北京图书馆的藏书。”^[44]为了更广泛地引起对馆际互借的重视,《文物参考资料》于1954年第3期刊发了译自苏联的《馆际互借的组织和技术》、《苏联科学院的馆际互借》等文章。此时,苏联馆际互借工作空前发展,“在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地区的图书馆没有和列宁图书馆建立了馆际借书关系。去年(1957)共有2,904个各种类型的图书馆与该馆建立了馆际借书关系”^[45]。共借出图书76,006册。这些介绍,促进了我国图书馆馆际互借工作的开展。

1949年,建国不久北京图书馆就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1949年我馆与这几家单位建立交换关系后,当年就收到他们寄来的俄文书1,209册。”^[46]“在一九五一年中,我馆(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赠送五十九个国家的一千二百个学术机关的书籍杂志共126,210册,收到国外的书籍杂志共50,496册。”^[47]苏联列宁图书馆在1953年就与36个国家的470个图书馆及科学机关进行了交换,至1954年达40个国家602个机关。1954年,列宁图书馆向各国寄出及收到的各种出版品就有399,000册^[48]。

通过国际交换工作,我国图书馆界向苏联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北京图书馆“从交换开始到现在,我们已收到苏联书刊四万七千余册,照片二百余张”^[49]。这些书刊在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钢筋混凝土桥梁”一书,为我国完成标准的拱桥设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北京图书馆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莫斯科科学院图书馆、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本图书馆等开展了交换活动,交换的书刊范围不断扩大。1957年,北京图书馆通过国际交换而获得的书刊达7万多册,科学院图书馆33,254册,北京大学图书馆3,156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也有1,000余册^[50]。

50年代我国馆际互借和国际交换工作,亦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其一,1950—1953年初创阶段。1953年,北京图书馆学习苏联经验,开始了国内馆际互借工作。在国际交换方面,主要是一些高校图书馆、研究所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以及少数几个省图书馆开展了这项工作,有些是主动联系得以建立交换关系。北京图书

馆在刚开始进行国际交换工作时,尚无专人负责,工作场所在一间简陋的地下室。1951年正式成立书刊国际交换组,逐步健全了工作制度。其二,广泛开展阶段,时间为1954—1958年。1954年,译介了苏联馆际互借的组织和技术,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馆际互借工作经验与规章。北京图书馆制订了馆际互借办法,标志着我国馆际互借工作步入规范化的阶段。在国际交换方面,北京图书馆总结了与苏联开展国际交换工作的成绩和方法,“四年来,中苏之间的图书交换工作,对两国人民文化的交流和友谊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国人民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苏联人民的革命历史和建设成就”^[49]。至1958年,北京图书馆已与90个国家1,908个单位建立了交换和赠送关系,当年全年寄出图书170,488册,收到图书有87,000册^[51]。1956年,中国科学院的国际交换统一由院图书馆进行。1956年后,各研究所及学会(学术团体)开始自己对外交换书刊,“到1959年7月止,我馆已和全世界56个国家的1,290个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通过交换收到的书刊共计261,741册,寄出的书刊共计136,265册”^[52]。其三,进一步找出差距,加快发展阶段。通过译介苏联相关文献信息,掌握苏联国际交换之动态,找出差距,迎头赶上。“1959年(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向国外寄出的科学图书总数达16万册以上,从国外的科学机关及图书馆收到的科学图书将近10万册”^[53]。并已与87个国家的2,100多个机构建立了交换关系。为加强这一工作,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8—1959年上半年,主动发出征求建立交换关系的信函5,489件,新发展交换单位644个,迅速缩小了与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的国际交换工作的差距。

7 结语

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中国经历了“以苏为师、全面学习”的阶段,包括是国家体制、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全方位的学习。尤其是经济建设,从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方针,到各种经济政策;从如何制订国家计划到设立管理部门等无不以苏联为榜样。在教育战线上,通过全国院系调整,同样进入了全面学苏的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了数千种苏联书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译文、社论、评论、通讯等文章,以介绍苏联各条战线的成就和经验,大量组织各种报告会、演讲会、展览会等等,阐述学习苏联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图书馆界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大量译介苏联图书馆事业的成就与经验,以此指导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56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大会,制订“1956—

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确定了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和在这一阶段计划出版的重要著作。随之召开全国图书馆大会、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等,开始从“全面学习”阶段转入“以苏为鉴”阶段,通过学习苏联的经验,明确其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我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大厦。1960年代开始,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我国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但是,由于整个50年代的“全面学苏”,苏联的许多做法,其痕迹仍然大量存在。

(来稿时间:2016年9月)

参考文献:

1. 北京图书馆交换组. 四年来北京图书馆与苏联图书馆的书刊交换[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3):93-94
2. (苏)拉齐柯娃. 人民民主国家图书馆工作的新任务[J]. 李哲民,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2(3):16-19
3. 顽强和主动性能够战胜困难[J]. 群力,译. 图书馆工作, 1955(2):14-16
4. (苏)察列格拉德斯基,伊. 苏梦华校. 根据什么指标来判断图书馆工作[J]. 王名超,译. 图书馆学通讯, 1958(4):16-20
5. (苏)赫连科娃, A.A. 苏联图书馆建设的伟大成就[J]. 政安,译. 图书馆学通讯, 1959(11):4-10, 3
6. 李枫. 对目前我国图书馆群众工作的几点意见[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8):110-113
7. 陶振纲. 介绍列宁图书馆的“帮助读者”——关于阅读计划和推荐书目[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8):117-121
8. (苏)列宁. 致教育人民委员会[J]. 苏大梅,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4(1):71-72
9. (苏)加甫得罗夫, H. 四十年来的苏联图书馆事业[J]. 苏大梅,等,译. 图书馆学通讯, 1957(4-5):1-5
10. 柳成子, 张怀安. 对图书开架借阅问题的管见[J]. 图书馆学通讯, 1959(9):17-18
11. (苏)克连诺夫, A.B. 图书分类的本质和意义[J]. 张全新, 苏大梅,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0(8):3-8
12. 杜定友. 图书分类法底理论体系[J]. 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 1951, 2(12):1-3
13. 刘国钧, 史永元. 我国图书分类法发展的情况[J]. 图书馆学通讯, 1959(12):15-19
14. 张照.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初稿问题商榷[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5):41-52
15. 图书分类法座谈会记录摘要[J]. 文物参考资料, 1950(8):107-110
16. 苏联关于图书分类法的重要决议[J]. 苏大梅,译. 图书馆学通讯, 1958(6):21
17. 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通过苏联新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表[J]. 刘国钧,译. 图书馆学通讯, 1959(9):封三
18. (苏)柯连捷尔. 论省立图书馆的书目提要手册[J]. 文物参考资料, 1952(3):73-78
19. (苏)伊凡诺娃. 关于编制介绍性的书目提要的工作经验[J]. 苏大梅,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2(3):69-72
20. 彭斐章. 关于苏联最近召开的书目工作会议的报告[J]. 图书馆学通讯, 1959(5):36-37
21. 彭斐章. 苏联省图书馆书目工作的组织[J]. 图书馆学通讯, 1960(2):19-22, 18
22. (苏)萨哈洛夫, 夫. 葛., 佛拉德琪娜, 兹. 勒. 论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的工作[J]. 文物参考工作, 1952(3):79-88
23. (苏)安巴祖勉. 争取图书馆目录的高品质[J]. 苏大梅,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3(2):88-94
24. 富立德. 论大众图书馆分类目录组织方法的问题[J]. 苏大梅,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3(2):104-110
25. (苏)格特曼诺娃. 一个区图书馆的参考书目提要工作[J]. 谢健亚,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4(8):103-105
26. (苏)达布罗沃里斯卡娅, 符. 伊. 字顺目录编制法[M]. 刘国钧,译. //北京图书馆编辑. 图书馆目录(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57:53-84
27. 伍宗华. 图书编目工作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5):61-68
28. (苏)华西里夫斯卡娅. 出版物著录统一条例[M]. 刘国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8:译者的话
29. (苏)维廉斯卡娅. 莫斯科大学图书馆的目录体系(未完)[J]. 刘国钧,译.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1956(9):13-17
30. 杜定友. 目录的体系[J]. 图书馆通讯, 1953(9):33-43
31. (苏)莫斯科国立莫洛托夫图书馆学院, 列宁格勒国立克鲁柏斯卡娅图书馆学院图书馆学编. “图书馆学”教学大纲[M].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译. (油印本), 1951:序言
32. 目录学[J]. 张先模,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4(11):111-117
33. 苏联图书馆学界开展关于目录学理论问题的讨论[J]. 范先翔,译. 图书馆学通讯, 1959(3):48-49
34. (苏)苏俄部长会议文化教育机关事务委员会, 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科学方法研究室. 区图书馆工作人员一个月进修班图书馆事业课程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1952年公布)[J]. 刘国钧,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3(10):16-27
35. (苏)苏俄部长会议文化教育机关事务委员会, 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科学方法研究室. 农村图书馆工作人员两个月训练班图书馆事业课程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1952年公布)[J]. 刘国钧,译. 文物参考资料, 1953(10):27-33
36. 朱晓刚. 我国大学课程观的反思与建构[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7:66
37. 教育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1952-09-05)[M].//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166-168
38. 鲍振西. 学习. 生活. 友谊[J]. 图书馆工作, 1957(11):34-36
39. 徐引篪, 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79

(下转 62 页)

23.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7: 236-246
24. 陈原. 《张元济年谱》代序 [A]// 陈原出版文集.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372
25. 杜定友. 我与图书馆学 [A]// 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 南京: 江苏图书馆学会, 1987:59
26. 新书介绍: 王云五大辞典 [J]. 国立北平图书馆学刊, 1930 (5): 126-127
27. 何日章等. 图书馆同人对于万有文库之意见 [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9 (1-2): 63-68
28. 沈祖荣. 图书馆所希望于出版界的 [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3 (2): 133-138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ublishers and Libraries and Influen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Study on Publisher Wang Yunwu'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brarianship

Deng Wenchi

(Hunan Library)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Wang Yunwu'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brarianship that is promoted library practice and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analyzes the attention and debate aroused in libraries that Wang Yunwu invented Uniform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Books, Four—Corner Index System and edited Universal Libraries. Finall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publishers and libraries should discuss the way of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peaceful, understanding and tolerant attitude, rather than the game each other based on different position.

〔Keywords〕 Wang Yunwu Publishing circ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circ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practic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作者简介〕 邓文池 (1986-), 男, 湖南图书馆馆员, 发文多篇。

(上接 55 页)

40. (苏)丘巴梁. 普通图书馆学 [M]. 徐克敏, 郑莉莉, 周文骏, 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8
41. 党跃武. 世为书香家, 行为图林范——著名图书馆学家孙云畴教授传略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5 (2): 113-122
42. 黄宗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风雨历程 [M]// 马费成. 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服务精神.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90-107
43. “图书馆学通讯”编辑部. 编后语 [J]. 图书馆学通讯, 1959 (1): 23
44.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北京图书馆建立馆际互借办法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 (3): 95
45. 鲍振西. 列宁图书馆馆际借书工作——国立列宁图书馆外借部访问记 [J]. 图书馆学通讯, 1959 (6): 38-40
46. 段洁滨. 书刊国际交换工作回顾与探索 [J]. 图书馆论坛, 2002 (4): 20-23
47. (苏)辙波达略夫. 苏联科学院的国际书刊交换工作 [J]. 周进楷, 译. 图书馆通讯, 1953 (1): 2-4
48. 苏联图书馆及其藏书的数量发展 [J]. 双文, 译. 图书馆工作, 1957 (1): 36
49. 北京图书馆交换组. 四年来北京图书馆与苏联图书馆的书刊交换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 (3): 93-94
50. 于声. 论图书馆事业的共产主义协作 [J]. 图书馆学通讯, 1958 (6): 3-9
51. 李致忠.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 1909-2009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187
5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十年来的工作 [J].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1959 (9): 4-13
53. 苏联科学院图书馆与国外的图书交换 [J]. 徐文绪, 译. 图书馆学通讯, 1960 (5): 43

The Influence of Soviet Union Librarianship to China in 1950s

Wu Tunian

(Jia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Abstract〕 Through a brief description abou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following aspect of Chinese libraries: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library works in transl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ervice of library spirit and library publicity, introduction and guidance of theory and directory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ing, library science teaching system introduc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and to learn from the Soviet Union library, to carry out library interlibrary loan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tc.. It also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fr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oviet Union libraries.

〔Keywords〕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Librarianship China 1950s Librarianship history

〔作者简介〕 吴徐年 (1954-), 男, 江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已发论文 150 余篇, 出版专著 1 部, 合著 1 部, 研究方向: 图书馆史。